从“知其然” 到“知其所以然”
在语言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

Yanyi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当今众多语言教学法的主要目标是对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培训。因此，衡量教学的成功与否大都通过语言技能来体现，尤其是语言交流能力。这一趋势不但反映在课堂教学上，而且也反映在语言教学研究、教师培训、教程和教材上。 Kinoshita & Zhang 于 2014 年提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中语言教学的目的。她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的语言课应被视为一种“人文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目的是智能开发和超语言的知识传授。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中的语言课的重点之一应该是提高学习者的普遍认知水平，培养其思辨能力，使其对目的语国家和当今世界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本文将从人文教育这一视角来审视一个将“培训”和“教育”齐头并进的教学实践和体验，重点探讨人文教育在中高级汉语课中的体现，包括课程理念及一系列旨在使学习者深层次、多方面、零距离地探讨和思考今日中国的课堂活动，培养其全面、均衡的思辨能力，从而促使其对目的语国家（中国）的了解不但“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关键词: 人文教育, 思辨能力, 课堂互动, 外语教学, 课程设置

Keywords: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 foreign language pedagogy, syllabus design

一. 前言

Ur 在 2006 年《语言教学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区分了两个教师培训中常用的概念：“训练”和“教育”。 Ur 认为，“训练”是针对培业训职中所必须具备的技能。而“教育”则是一个培养人的过程，尤其在“道德化、会和智能等方面，使学习者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社会的一分子” (p. 3) [1]。纵观当今众多

1. 本文中的汉语引述翻译均出自作者本人。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漢語教學研究—美國中文教師學會學報) 52:1 (2017), **77–92**.
DOI 10.1075/csl.52.1.04zha
ISSN 2451-828X / E-ISSN 2451-8298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的语言教学法及师资培训教材和语言教学与研究文献，不难看出其主要目标定位在对学习者的语言技能培训上[2]，使语言学习者能够应用所学语言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生存、生活、工作。衡量教学的成功与否也大都通过语言技能来体现，尤其是语言交流能力。这一趋势不但反映在课堂教学上，而且也反映在语言教学研究、教师培训、教程和教材上。

Kinoshita & Zhang于 2014 年提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中语言教学的目的和目标。她们认为，语言知识和技能固然是语言课的重要部分，但高等教育中的语言课应被视为一种“人文教育”，目的是智能和思辨能力的开发和超语言的知识传授。她们的观点与 Rivers 早在 1968 年所倡议的在语言教学中培养“文化人” (a cultured person) 不谋而合。 Rivers 认为，一个成功的二语习得者应该不但具有语言技能，而且还应有高水平的智能、理解力和想象力，应该能够通过审视自身长久以来一直所持有的由其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对事物的态度、反应和固有观点。她们认为这种“内视”思辨能力应该是语言教学目的之一。也就是说，语言课的重点，尤其是高等教育中语言课的重点之一，应该像人文教育那样，不但教授知识，而且培养学生的思辨，分析、认知力，使其对目的语国家和当今世界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她们指出，虽然这一理念并未被目前的主流语言教学法所排斥，但也没有成为语言教学、科研和教师培训的主导方向和内容。

在高等教学的语言课堂上有无可能培养这种能力？如何操作才能给予学生真正的教育机会，帮助他们最终能够深层次地认识理解目的语国家，包括它的语言、人民、文化、以及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本文将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一套使语言技能培训和人文教育齐头并进的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实践，重点讨论人文教育在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一门中高级汉语课中的体现，包括课程设计理念及一系列旨在使学生深层次、多方面、零距离地探讨和思考每一课中所涉及的今日中国的教学策略和课堂活动，以及如何通过这些策略和活动达到培养学生全面、均衡的思辨能力，从而使其对中国的各个方面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二. 外语学习的目的与价值

外语学习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其答案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二十世纪初， Jesperson (1904) 在他《如何教外语》一书中说道：“外语教学的最高目标是直接接触一个国家的最佳思想和制度，和它的文学和文化。简而言之，是直接接触一个国家的精神”（原引于 Rivers, 1968, p. 261）。美国麻省密尔顿中学教育委员会于 1933 年提出，外语学习的主要价值在于“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建立国际间的友谊和理解，从而达到世界和平”（原

2. 如 Harmer (2007) , Ur (2006) ,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ELT Journal,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Language and Curriculum,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Education.

引于 Rivers, 1968, p. 261）。然而当时的主流教学法,如语法学习、翻译、死记硬背课本知识等，很难同这些崇高的目标相匹配。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机动、越来越国际化。“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概念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直接的跨文化交流和实地体验外国文化成为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现实。而外语也因此变得更加工具化。语言知识的传授逐渐转向语言运用。培养用目的语做事的能力成为各个语言教学法的最终目的之一。衡量语言教学法的实用性和效验性则是其“交际”价值，习得水平和结果常常用类似“能够／可以做”（“can do”）这样的表述来鉴定。外语教学和学习越来越向职业培训方向发展，带有非常明确的实用目的和倾向。

然而，近年来，外语研究和教学界有呼声倡议重新给外语教学定位。Liddicoat & Scarino (2013) 呼吁外语教学应该将重点放在跨文化体验和培养理解力上。他们认为：“语言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学习者在对语言和文化的多样化的亲身体验中产生的一种新的跨文化视角” (p. 7)。他们指出“互动与体验” (interactions and experiences) 应成为语言教学和习得的核心。Kinoshita & Zhang (2014)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高校中的外语课程应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提倡和促进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尤其是在探索发现新思想和新视角方面” (Blaich, Bost, Chan & Lynch, 2004, p. 13)。Kinoshita & Zhang (2014) 认为外语学习是培养这种态度和视角的手段之一。她们指出，成人阶段的外语学习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挑战。比如，这是唯一一个成人不如儿童的学习项目 (Hyltenstam & Abrahamson, 2003)，而且成人使用与儿童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学习语言 (Bley-Vroman, 1990)。由于语言是一个“符号＋意思”的抽象系统，成人学习者从第一天起就运用其高层次的认知能力来接触这个系统，并在习得的过程中不断重复使用。比如设立和检验假设、纠正错误、对反馈的分析和吸收。吸收由于目的语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习俗常常被语法化和词汇化（如日语中语法化了的尊称和汉语中词汇化了的家族成员的称呼），语言学习为学习者提供了一扇认识和体验不同世界和不同生活的窗口，以及一套深深扎根于传统、历史和政治的价值系统。文化冲突在学习者的内心中或明或暗地发生着，而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也在不时地受到挑战。所有这一切都是培养思辨能力和新的观察视角的机会。这在一所澳洲高校毕业生的来信中得到验证(Kinoshita & Zhang 2014)。他们认为他们在校学习日语的两个最大的收获是个人品质的培育和日语能力。前者指的是认识到自己的固有观念，并从多个方面了解并理解每个问题。几乎半数之多的毕业生在谈到学习日语的收获时提到与人文教育有关的理念，如思辨型思维、分析能力、学习如何学习、认识自身的固有观念、参与并享受文化经历等等(Winter et al 1981)。这些毕业生的反馈展示了短期“训练”和“教育”齐头并进的语言课程所带来的长期的收获。

类似的理念也体现在“主题教学”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当中 (Snow & Brinton 1997)。主题教学的重点不是语言 (Murphey, 1997)，其教学内容由不同的主题组成，如环境、教育、电视广告、两国的教育系统等等，通

过使用目的语讲授和讨论这些问题，学生们不但能够接触和使用目的语，并且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达到人文教育的目的。

那么如何将人文教育溶入到语言课中，使其成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呢？以下将通过“独生子女”这一课的教学活动来详细介绍这一教学实践。

三.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A. 课程设置

这是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三年级汉语课上的一次教学实践，课上学生的汉语水平为中上级[3]。该课程为主修汉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课程使用汉语教授，每周4个课时：2个小时讲座课，2个小时练习课。课程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并通过阅读和讨论当今中国的主要事件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全班共有 36 名学生，绝大部分是澳洲本地非汉语背景的学生，他们来自文理科不同专业。其中很多人去过中国大陆或台湾，有在目的语国家或地区短期学习或旅游的经验。

课上所用的课本是《变化中的中国》 (Li & Liu, 2010) ，书中有十个单元，每一单元都涉及一个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比如：独生子女、双独家庭、中国妇女的地位、环境问题、离婚问题、就业问题、老年人的爱情生活、消费行为、个人投资、互联网等等。编者的意图是“最大限度地提供思考和讨论的机会，培养语言及交流技能” (p.x) 。课文及阅读材料所用的大多是在文学作品、官方文件、报刊杂志、电视新闻等常见的书面语，句子长，结构复杂，有很多成语、惯用语及书面语词汇。

中国的时事话题和书面语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本课的教学重点。为了能够阅读理解课文，学生们必须学习掌握一套新的书面语词汇，而为了理解每句话的意思，他们必须学习分解长句和复杂句的结构。从语言培训的角度来看，课程重点是逐渐提高学生对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的敏感度，培养他们阅读理解书面语文章的能力，并且能够在所写的文章中使用学过的书面语。

与此同时，本课的另一个重点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扩展他们的视角。本课的学生大多为大学本科生，其中很多人修过用英语授课的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科目的课程，不少人去过中国，有过在中国生活和与中国人交流的经历。此外，通过媒介他们知道不少有关中国的事情，包括课本中的一些话题。但是，他们的“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比

3. 相当于 ACTFL Intermediate High 或 Advanced Low。 学生的词汇量相当于《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6 册。

如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了解多少？有多深？从什么角度？“知道”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认知状态，可以是表面化的“知其然”，也可以是深度的“知其所以然”。后者不但需要大量的阅读，而且需要能够从多方面来深度分析研究，尤其是要能够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和体会 (Otega, 2009; Markee & Kasper, 2004) 。这正是本课程的另一重点所在：培养学生学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全面均衡地观察、认识、思考问题。

B. 学生已经知道什么？

任何学习者都会带着从生活和过去的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来到一个新的学习环境，成人尤其如此。成人同时还带来基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的一套信念系统。教育，尤其是大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是引导学生系统地、深刻地、批判性地审视思考每个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达到新的认知高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本课教学的第一步是了解学生们对中国的人口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知识程度，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多少？

答案是，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不知道的也很多。他们知道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他们知道“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控制人口。他们还知道女婴常常不受欢迎，传统观念及人口政策造成中国一些地区出现性别失衡现象。然而，绝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他们也不知道澳大利亚的人口数字）。他们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何时启动的，也不知道其历史原因。他们不知道政策实施的结果，以及这个政策对中国、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意义和贡献。他们觉得中国人民不喜欢这个政策，这个政策造就了一代“小皇帝”和“小公主”。

以上的叙述可以用来描述课本中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的话题。学生们“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这种认知结构肤浅、片面，而且完全是建立在局外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上。用这种知识去分析看待变化中的中国，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只会进一步加深偏见和误解。

C. 课程设置理念和实践

如果本课的定位是“语言课”，那么“独生子女政策”仅仅会作为文化背景来介绍，“知其所以然”不会作为教学重点体现在课时分配、教学活动和课堂测试上。但如果人文教育是本课的中心理念，思辨型思维和能力作为其重点培养目标，那么“知其所以然”必然是本课的重点所在之一，从教学到测试都要有所体现。

基于学生们已有的（大多从西方媒体得到的）知识和认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转变观察分析视角上。也就是说，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思辨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事国，即中国的国情，和当事人，即独生子女的感受。而要得到这些知识信息，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生

活经历能够起到一种启动作用，激发学生反省内视，探讨新的思维视角。但是，真正用目的语与目的语国家的人交际互动是在外语教学中最明显的缺陷 (李, 2014; Liddicoat & Scarino, 2013)，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教学实践，如邀请目的语为母语的人进课堂交流 (Zhang, 2005)，和通过 e-Chat 与千里之外的目的语人员交流 (Kinoshita, 2008)。本课采用了“开门”方针：把中国人请进课堂，把澳洲学生推出课堂，通过课内外在思想层面上的接触和交流，促使学生体验、探讨、反省、提问，并思辨性地审视反思他们现有的有关“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认识和观点。

活动 A. 请进来

课本第十三课的课文题目是《贝贝进行曲》，内容是一个名叫“贝贝”的小男孩。他父母对他百般娇惯、百依百顺，这使他变得自私，自我中心，追求物质享受，毫不顾及父母的感受。这一课所涉及的话题是独生子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即这个政策造就了中国的一代“小皇帝”和“小公主”。

事实果真如此吗？独生子女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成长的？是否都像贝贝那样被宠坏惯坏了？

回答这些问题和了解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的最佳方式是接触中国的独生子女。虽然在澳洲的大学里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独生子女，他们和澳洲学生一同上课，有的甚至是室友。但类似“独生子女的生活”和“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这样的话题在他们的日常谈话中却很少出现。

任课老师邀请了一位从中国来读研的女生，二十岁出头。在讲座课的最初 10 分钟，她用汉语讲了她的成长经历，如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她的家庭、生活环境、父母对她的期望和要求，和她成长时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等。总的说来，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非常忙碌，没有周末，因为每个周末都要去上各种音乐、文化补习班。她所有的要求父母都会满足，但条件是学习成绩一定要优秀。她儿时并不孤独，因为和祖父母同住，与表兄妹在一起。但当她搬回父母家并开始上学后，生活变得孤独起来。她说，父母对她在学习上的期望、压力和在生活中的宠爱，不但是她成长时期的特点，也是她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同学和朋友的生活特点。

在之后的问答中，学生们问了很多问题。比如，她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她是如何应对来自父母的压力的。他们对她的中学好友由于承受不了父母的压力而自杀感到震惊。这位中国学生回答说，总的来说，她对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非常满意，她努力实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顺利考上大学。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无可指摘。

点评. 邀请一位中国“独生子女”进入课堂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亲耳听到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和感受。这是一种直接的思想上的交流。这位独生

女的讲述中涉及了很多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因素，比如，如何带、养孩子，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对下一代的关注和期望。她短短的自述清晰地展示了一种与澳洲学生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成长经历。虽然她的成长经历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但对于澳洲学生来说，这是一种他们以前毫无所知的生活成长方式，他们甚至感到有些震惊。

个人经历是激发回忆和比较的有力工具。一个与学生年龄相仿的活生生的人站在教室前面，讲述自己曾经的生活，分享感受，这比从教科书、媒体和刊物上得来的二手信息要真实可信得多。由此而来的对自己的生活成长背景的思考和比较，自然而然会引起对自己现有知识和所持观点产生反思。聆听中国独生女的自述以及问答互动成为通向培养思辨能力的第一步。

活动 B. 讲座

独生女的讲述结束后，任课老师用汉语做了一个 15 分钟的有关中国人口政策的小讲座（讲座课件见附件）。讲座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北京大学马寅初教授同毛泽东主席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辩论开始，涉及历次重大的人口政策变化。讲座还简要地提到了独生子女和他们自己的家庭所面对的压力。讲座自始而终都跟中国的国情、历史和本土文化大背景紧密相连，如传统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子女对父母的“孝”的观念。讲座和独生女的自述呈现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多个不同侧面。讲座最后，老师提到从多方面了解分析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单纯片面地从自己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别国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点评. 讲座的目的是在独生女自述而得来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建立在事实上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深入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以及人口政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和明显结果的人口政策。要真正了解和理解这个政策，就必须明白它的来龙去脉。短短的讲座为学生提供了历史背景，揭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说明了这个政策并非政府的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建国三十多年后中国在不得不面对的人口压力下所采取的对策。 讲座主要是鼓励学生采纳一个相对的、客观的、建立在中国国情上的视角，从历史、文化，和民生等多方面来批判性地认识思考这个政策。

活动 C. 辩论

两个讲座课之后是练习课[4]，目的是通过练习来巩固所学的知识。在每周两个学时的练习课上，一个学时用来练习使用书面语来写不同体裁的作文，另一个学时用来练习口语。每个学时的练习课分为两个班，每班18位学生。

4. 第二个讲座课的重点是课文解读，这是语言训练部分，在此省略。

口语课的内容是辩论。题目是“一个孩子好”。 每个学生都必须选择“同意”或“不同意”，他们的选择不必代表他们的真实观点。学生们在课下准备辩论材料，比如上网阅读寻找有关信息等。

辩论开始前，学生们分为“同意”和“不同意”两组（各 9–10 人），分别讨论他们所准备的材料和辩论策略。老师在需要时为学生提供一些词汇，并启发引导他们的辩论内容和方式。

辩论时，支持方和反对方的每个学生轮流发言 1–2 分钟，阐述自己和本组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之后是自由辩论。老师作为“裁判”记述每个“有效”（而不是“正确”）论点。 最后 5 分钟，老师做一个反馈性小结，复述所有有效论点，宣布得胜组，并邀请学生进一步发表意见和提出反馈。

辩论非常激烈，“同意”组用一些成功的“独生子女”名人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不同意”组用贝贝作为反面材料来反驳。他们从家庭、社会、环境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班上有几个澳洲学生是独生子女，他们更是积极参与，赞成一个孩子好。

点评. 独生女的自述和老师的讲座为学生提供了感性和理性知识与材料，激发了他们的思考。而对问题进一步的理解则需要通过某种“输出”来消化实现。Swaine (1985) 认为，语言习得最终是靠“输出”来完成的。因为语言“输出”促使学习者解读语法，对二语进行即时加工处理。虽然 Swain 阐述的是语言习得，但对思辨和智能培育同样适用。能够清楚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需要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对问题了解透彻，同时有很强的语言操作能力。有准备地用目的语辩论这一活动将这些能力汇总在一起，因此，它不但是一种语言训练活动，也是一种智能和思辨活动。

辩论前 15 分钟的小组准备是一种热身活动，也是一种交流活动，让学生们了解交流相同的观点。在辩论中，学生们交流不同的观点，他们紧扣问题的中心，用自己的经历和课上课下所学的知识来支持或反驳“一个孩子好”这一立论。由于每个学生都是某人的子女，而且都是刚刚过了少年时期，大部分都有兄弟姐妹，他们对这个题目有很多感受。辩论实际上是一个循环，不断的自我反省：学生们不但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并且倾听反对声音，从各种角度来探讨新的论点和论据。这也是允许学生站在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立场一方来辩论的目的之一。辩论活动首次见证了以事实为基础的反思型的认识和比较高层次的多维式思辨方式。

活动 D. 走出去

“走出去” 指的是“到课堂外去学习”。这个活动由一组“探索型作业”组成，被安排在语言和知识传授和消化练习阶段之后。“探索型作业”将语言技能和思辨能力溶于一体，给学生自主权，让他们走出课堂去进一步探讨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个题目。

在此之前的各种教学活动都是由老师组织安排的。老师邀请独生女来课堂，老师收集筛选讲座材料和解答语言点。老师选定辩论题目并组织辩论。这些课堂教学和练习活动都是由老师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但这不够。在这个基础上，学生应该走出课堂，像 Liddicoat & Scarino (2013) 所说的，去同目的语国家的人交流，去体验、感受、了解他们的想法，从而达到“知其所以然”。

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一组探索型作业包括三个部分： (1) 采访一个中国人；(2) 根据采访写一篇作文；(3) 根据采访和作文做一个演讲。这三部分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整体，进一步扩展学生们的语言和思辨能力。探索型作业必须用汉语完成。老师提供了一份用汉语写的“作业说明”，上面有作业要求、评分标准及建议[5]。

1. ***采访***. 每个学生要针对一个问题用汉语采访一位汉语为母语的华人，背景不限。采访大约 10–20 分钟，可以两人一组一起采访，采访录音需要上传到课程的网站上。采访本身不在测试之内，但它会被用来作为口语测试的参考。

学生们的采访对象有朋友、邻居、室友、打工的同事，以及家庭好友。有几个同学采访了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学生采访了同校的中国留学生（独生子女）。采访题目丰富多彩，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中国的婚姻和离婚现象，从环境问题到城市就业情况，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中国人的消费行为等等。

点评. 要达到对“独生子女政策”或任何一个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的深入了解，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放弃“局外人”的立场，消除同中国人之间的精神和空间距离。邀请中国独生女到课堂上来及在课堂外面对面地进行交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采访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主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远离老师的“监督”，自己准备采访题目和内容，寻找采访对象并进行采访。这种在思想上的交流使学生们进一步探索和发现问题，满足好奇。对于被采访者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分析批判式地同一个“外国人”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和感受。

采访同时也是一次汉语水平能力测试。在课堂教学和测试中，老师总会尽量调整自己的语速、词汇、句子长度等等，使用学生们能够听懂的语言。而普通母语使用者不会这样做。因此，在自然交流中，尤其是当交流对象是陌生人时，学生们的外语交流技能受到真正的考验。他们需要主动接触采访对象，解释采访目的，征得他们的同意。在采访中，他们需要听懂对方的讲述，并清晰地提问和表达，有时还需要就某个问题与采访对象进行深入交谈。这个跨文化面对面的交流不是随意的闲谈，而是有针对性

5. 建议:如果被采访人是个独生子女，那么采访的重点可以放在她／他的童年生活和成长过程，她／他的家庭，目前的生活，对未来的想法和计划，对“独生子女”这个群体和“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等等。

的思想交流，也是探索型作业的第一步，因此，能够成功地完成采访，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是学生们语言（交流）能力的最好验证。

2. ***作文***. 根据采访内容，每个学生都需要写一篇 800 到 1000 字的汉语作文。在作文中，他们需要介绍被采访人，总结交谈内容，表达体会感想。作文体裁不限，可以是叙述文、政论文，也可以是比较文、传记等。

点评. 同本课的其他教学活动一样，作文也有训练语言技能和培养思辨能力的双重教学作用。在语言技能训练方面，学生们需要用他们的听说能力进行采访，用他们的写作能力来复述采访内容。作文需要使用书面语，也需要结构清晰，表达准确连贯。在思辨能力方面，学生需要阐述他们对采访题目的认识和体会。至此，学生们都意识到 (1) 不能单纯地从自身文化的视角来评判另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和政策； (2) 有意义和有成效的评判只能是建立在对事实和当地国情的全面了解之上; (3) 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这些都体现在他们的作文之中。

3. ***演讲***. 作为期末口语考试，每个学生都要在课上做一个 10 到 15 分钟的演讲。演讲内容是各自的采访和作文。 学生可以用 PowerPoint，但只能有图片、小标题和关键词。演讲的学生不但要回答学生和老师的问题，而且需要解释自己的分析、论点和结论，有时还需要同提出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争论。

点评. 演讲是综合采访（听、说）和作文（写）的一个口语活动。它是探索性作业的高潮，是学生展示其语言水平、知识，和思辨能力的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活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一起成长。同中国人在课外的思想交流使学生们得益匪浅，这体现在演讲质量上。题目的多样性和体会的深度都显示了学生们的兴趣、热情和参与程度。

四. 学习成果

探索型作业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结论：充分的、有系统的准备使学生自己掌握进行课堂外学习活动，在提升智能和思辨能力方面既有效又有益。下面是这方面在学生作文中的体现。

全班 36 位学生中， 21 位选择了“独生子”这个题目，其余 14 篇中， 各有三篇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消费行为、经济发展、离婚问题。另各有一篇涉及中国的就业问题和比较中国在经济改革前后的变化。在 21 篇有关人口政策的作文中， 5 篇是纯叙述式的，另 16 篇包含了思辨性分析和反思，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新认识。

很多学生从正反两方面讨论了中国的人口政策，并理性地评判了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和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黑白分明地来评论“独生子女政策”,而是从中国的大环境和国情出发来探讨这一政

策所取得的成果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种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意味着均衡的反思、谨慎的结论，以及用事实来阐述观点和讨论问题的能力。这一切都意味着比较成熟的思辨能力。下面两例摘自学生的作文[6]：

(1) 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确实使生育率下降了，但也产生了一个“独生子女是好或不好”的辩论。好处包括第一，孩子会得到家庭全部的爱，第二是孩子会有[已]过很轻松和比较高兴的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是没有兄弟姐［么子女］可能就不会分享，反而会比较自私，也有可能社会交流能力比较差，生活比较孤独。如果受到父母的溺爱，孩子长大就不会独立。 (#17)

(2) 根据 BBC 的统计，政策成功的在三十年里[使]中国人口减少了四亿的人。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了］种种问题：
一、　人民的权利问题....
二、　失独老人现象....
随着近年来政府慢慢放松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失独老人现象未来会减少。人民的权利问题方面，政府现在让双独家庭有两个孩子。在许多年里政府应该又会再放松，这些问题也慢慢减少。 (#16)

这门以人文教育为重点之一的汉语课把学生们领上了一条探索发现的道路。他们不但知道了课本中所涉及的中国当今的重大问题、政策和事件，即“知其然”，而且知道了这些问题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根源，即“知其所以然”。同时，通过与所谓“小皇帝”和“小公主”在思想层面上对话，了解了“当事人”的生活和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这些活动使学生们现有的知识得到更新，一种崭新的“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开始萌芽。这些在以下三例作文摘选中得到体现：

(3) 小的时候，我跟我的两个妹妹一起玩，我们感情很好，过的很快乐。那时候我觉得有兄弟姐妹是非常理想的。我长大后，听说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因为以前我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看法不太好，所以我觉得独生子会很孤单。但是，在我学了很多关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后，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有这个政策。 (#1)

(4) 我采访了一位独生女以后，发现了很多西方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观点都是谬论，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来揭穿这些谬论.... 西方人觉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小皇帝”.... 在我宿舍里大概有五百个学生，我们必须合用一个大厨房。如果 xxx 是小皇帝的话，她可能会讨厌跟别人一起用一个厨房。可是我天天看她一边做饭，一边和其他人聊天，她经常很高兴地让别人尝她自己做的菜... 她父母的教养方式让她慢慢的独立了。从她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6. 本文所引用的范例均出自于非汉语背景的学生作文。

中国独生子女不一定是小皇帝.... 采访 xxx 以后，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政策不完全是坏的。 (#18)

(5) 此番谈话，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也有可能反[映]我国的同样面临的老年化的问题... (#6)

在这里，学生们反思内审自己所持有的看法和逐渐转变的态度和观点。如，“在我学了很多关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学生 #1过去对独生子女政策“不太好”的看法逐渐被一种新的认识所替代：“我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政府有这个政策。”同样，采访了一位中国独生女留学生之后，学生 #18 “发现了很多西方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观点都是谬论，”并且知道了“这［个］政策不完全是坏的”。 被采访的独生女并不像“贝贝”和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她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独生子女不一定是小皇帝。”而同中国独生子的交谈使学生 #6 “发现了一些问题，”并由此联系到到本国（澳大利亚）同样的问题。

显然，新发现和认识的更新是与特定的中国人有目的有意义的交流以及了解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的直接结果。看问题角度的改变意味着思想的开放和一种新的思辨能力的开发。这些都是人文教育目标的一部分。

与同龄人的沟通，也引发了思辨性的比较和体会。有些学生在作文里联系自己的生活和成长，思考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含义。以下是两例：

(6) 西方独生子女也有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并且经历同样的孤独... 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存在缺点，但没有非常大的问题。父母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能很好的照顾小孩，数量并不重要。 (#19)

(7) XXX 说他三年高中经历很“辛苦”,因为在中国，高考决定人生。从高一开始，他每天都准备高考。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所以给孩子很多压力。 Xxx 也很孤独。不但没有兄弟姐妹，而且没有机会跟朋友们玩。而作为同龄人，我的澳洲高中经历完全不一样。首先，虽然澳洲也有期末考试，但澳洲“高考”比较轻松。澳洲高中学生不用从高一开始准备考试。其次，直到高三，我仍然跟朋友们玩。最后，我不是一个独生子... 所以我没有感觉“孤独”。 (#10)

学生 #19 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独生子“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并且经历同样的孤独……”。作为一个独生子女，她显然有一种代入感，能够体会中国独生子女的生活。她的结论是虽然政策“存在缺点”，但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她觉得一个家庭中有多少孩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的作用和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 #10 的看法。他很庆幸自己不是独生子，并且是在澳洲上的中小学。他对自己的童年生活非常满意。他所表达的“庆幸”感也是源于采访而激发的比较。

“比较”是一个能够使人意识到差异的有效手段。这也是思辨型反思的基础之一。使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介绍学习目的语文化在语言教学研究领域已有论述（如邢 2010）。在本课中，学生们通过对政策、个人生活等的

分析和理解，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比较，促进了他们的认同感及多方面看问题的能力。而这是人文教育的价值所在。

有意思的是，探索性的跨文化交谈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它也给中国学生提供了一次（可能从未有过的）回想反思他们的生活和发表自己对中国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看法的机会，而且对象是澳洲同龄人。绝大部分被访的中国留学生接受“独生子女政策”，他们表示虽然“独生子女政策”有些负面问题，但总体上是好的，是中国在当时所必需的。虽然“孤独”和“压力”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经历，他们仍然感到他们的童年非常幸福、正常，与中国非独生子女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将能够来澳洲读书归功于自己是独生子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家中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不可能有财力将他们送出国留学。即便如此，当问到他们今后的家庭计划时，每个人都说不会只要一个孩子。

五. 结论

高校的外语课程，尤其是中高级水平的外语课程，应该是类似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类的以智能教育为主导的课程。本文所介绍的教学实践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尝试，通过零距离跨文化交流体验来培养汉语课学生的思辨能力。课程的设计理念是打开教室的大门，使学生始终保持着一种动态思维，自己去经历、去见识、去联想、去尝试、探索、了解、分析本国和目的语国各个时期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而非停留在讲述传统的文化风俗如节假日、礼节、送礼、食品、禁用语等等。学生们最终所形成的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更加有力的思辨和分析能力，能够比较均衡地、全面地、从当事人的角度去看问题。正如 Kramsch (1993) 和 Rivers (1968) 指出的那样，世界是由很多极其不同的成分组成的，但在差异纷纷的表面下蕴藏着很多相同点。教育，包括“语言教育”，的使命之一是培养一种能够认识、理解和欣赏各种差异并克服单一视角和受自身文化背景所限制的观察分析视角，通过深层次的解读和思想上的交流和理解，达到包容和接受各种文化差异这一目的。这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需要积极地去培养。 高校的外语课应该采取这一理念，注重“教育”,培养智能和思辨能力，同时训练语言技能，从而避免造就能够使用最佳的目的语来包装其对目的语国家和人民无礼无知的人。

References

Blaich, C., Bost, A., Chan, E. and Lynch, R. (2004). “Defining liberal arts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ley-Vroman, R. (1990).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inguistic Analysis*, 20, 3–47.

Harmer, J. (2007).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Hyltenstam, K., and Abrahamsson, N. (2003).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in SLA." In J. Doughty and M. Long (Eds.),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538–588). Oxford: Blackwell. doi: 10.1002/9780470756492.ch17

Jespersen, O. (1904). *How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td.

Kinoshita, Y. (2008). "Using an audio-video chat program in language learning." In F. Zhang and B. Barber (Eds.),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omputer-Enhanc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pp.507–520). London: IGI Global. doi: 10.4018/978-1-59904-895-6.ch030

Kinoshita, Y. and Zhang, Y. (2014). "Why do we teach languages at universitie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elect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National LCNAU Colloquium*, 87–100.

Kramsch, C. (1993). "Language study as a border study: Experiencing differ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8, 349–358. doi: 10.2307/1503764

Li, D., and Liu, I. (2010). *Reading into a new China: Integrated skills for advanced Chinese*. *《变化中的中国》* (Vol 2). Boston: Cheng & Tsui Company, Inc.

Li, Z. 李朝晖. (2014). "目的语与非目的语的语言环境文化学习方式探讨" [Mùdìyǔ yǔ fēi mùdìyǔ de yǔyán huánjìng wénhuà xuéxí fāngshì tàntǎo: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arget and non-target language settings].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Hànyǔ Guójì Chuánbō Yánjiū: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 145–151.

Liddicoat, A., and Scarino, A. (2013).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doi: 10.1002/9781118482070

Markee, N., and Kasper, G. (2004). "Classroom talks: An introduction."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8, 491–500. doi: 10.1111/j.0026-7902.2004.t01-14-.x

Murphey, T. (1997).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in an EFL sett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In M. A. Snow and D. Brinton (eds.), *The content-based classroom*. Longman.

O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Rivers, W. (1968).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now, M. A., and Brinton, D. (1997). *The Content-based classroom: Perspectives and integrating language and content*. Longman.

Swain, M. (1985).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In S. M. Gass and C. G. 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235–253).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Ur, P. (2006).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nter, D., McClelland, D., and Stewart, A. (1981). "A new case for the liberal arts: Assessing institutional goals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Xing, Z. 邢志群. (2010). 试论汉语语言、文化的教学体系 [Shì lùn Hànyǔ yǔyán、wénhuà de jiàoxué tǐxì: On a pedagogical system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世界汉语教学* [Shìjiè Hànyǔ Jiàoxué: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4 (1), 93–102.

Zhang, Y. (2005). "Introducing native speakers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ournal of American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40 (3), 71–90.

附件：讲座课件

第十三课
贝贝进行曲 (第三周)

中国的独生子政策

- 五十年代：马寅初、毛泽东
- 七十年代：‘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
- 八十年代：独生子政策
- 九十年代：出生率降低
- 人口老化：65岁+
  - 2010: 8.9%;
  - 2050: 25.9%
- 2013年： 二孩政策
- 独生子：
  - ‘小皇帝’、溺爱、‘众星捧月’
  - 自私、自我为中心、无责任心、追求物质享受……’
  - 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压力、

全面 / 片面看问题
- 独生子政策
- 独生子女

Abstract

From knowing what to knowing why: a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pproach in a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In 2014, Kinoshita and Zhang called for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at advocates a "liberal arts"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beyond language facility. This paper is a reflection of a pedagogical practice that embraces this approach. The paper gives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and exposition of the design of a course that aims to promote a balanced and nuance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 language country – China. The paper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a suite of activities that engage pre-advanced students of L2 Chinese through in-depth contact with ideas and objects related to China, and the "why" of its contemporary issues.

Author's address

Yanyin Zhang
Chinese Studies,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yanyin.zhang@anu.edu.au